

■名家茶座

清代州县的佐杂,比如县丞、主簿、书吏、典史,尤其那些杂职官,都是些位居官场最底层的小官儿,因为见到的多是比自己大的官儿,故经常得磕头,因此,人们便用“磕头虫”来形容和指代这些小官儿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、邱捷《晚清官场镜像——杜凤治日记研究》174页,下出自本书的只注页数)。可见这些人地位很低,基本没有什么人格和尊严。

还备受制度歧视。隶卒中的皂隶、马快、禁卒、门子、弓兵、件作、粮差、轿夫,与奴仆、倡优一样,被朝廷称为贱业者。从乾隆三十五年始(1770),其子孙都不得参加科举。要参加须三代清白,即曾祖父、祖父和父亲都不曾从事过这些贱业(大象出版社、日·宫崎市定著、马云超译《科举史》第47页),可谓典型的“贱民”。

俸禄也很低。以清同治年间广东南海县为例:皂隶、马快、禁卒、件作等衙役每岁工食银均6两,遇闰加5钱。河南汤阴县乾隆年间,“本县门子二名,每

■余墨谈屏

曹操的自信

曹操的自信,恰好跟刘备的装腔作势、袁绍的色厉内荏形成对比,是那种由里而外的从容与洒脱。

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为突出“尊刘抑曹”主题,曹操一出场,就特意设计了一个凸显其性格奸诈的桥段“孟德献刀”。尽管,正史《三国志》及其他典籍,并无曹操刺董记载。正是小说家这一虚构,反证曹操是一个不尚空谈、有勇有谋且对未来充满自信的英雄人物。

试想,曹操作为董卓身边工作人员,深知刺杀董卓,难在如何摆平董卓贴身保镖吕布。基于此,曹操才需要有更为强大的自信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回“废汉帝陈留践位,谋董卓孟德献刀”,写曹操佩刀到董卓府上,恰待要刺,不想董卓从衣镜中,窥见曹操在背后拔刀,急回身问“孟德何为?”

此处,若内心无强大自信,会怎么样呢?一是将错就错,上演三国版荆轲刺秦王,玩个图穷匕首现。刺董不成,反成董卓刀下之鬼;二是一时呆若木鸡,等待的无非人头落地;三是跪地求饶,上演苦情戏,与虎谋皮。曹操高明之处,在三种情况都不在视野之内,脸不变色心不跳,乃持刀下跪,说“操有宝刀一口,献上恩相”!

要知道,剧情瞬间由行刺改砍刀。持刀、下跪、说辞一气和成,动作连贯,表情真挚。之间,必须无一丝一毫的惊慌和紊乱,才可以骗得过大好董卓。而这之中,内心若没有一点儿不自信,脸一白,手一抖,情绪反应到脸上,曹操的脑袋恐怕就要换个位置了。

偏偏儿地曹操就如此自信。这跟小说家为表现刘备自信,特意安排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,形成鲜明对比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一回“曹操煮酒论英雄,关公赚城斩车曹”,写刘备参与国舅董卓、西凉太守马腾等人发起,以剪除丞相曹操为目的“衣带诏”事件。事后,

名银六两;皂隶十六名,每名银六两”(《乾隆·汤阴县志》127页),可见“全国一盘棋”。

地位卑贱,收入微薄,但全国各地争做贱业者的却如过江之鲫,仅以清嘉道时期全国部分州县的差役数额为例,“四川一些州县超过2000名,山东州县差役,通常1000余名,湖南保庆府有2500多名,邵阳县有3000多名,安徽阜阳县有2000多名,仅差役头目就达200多名”(岳麓书社、张国骥《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》第11页)。光绪三年,广东南海知县杜凤治下乡征粮,随同的差头、壮勇、轿夫等差役就达200多人(341页),真是浩浩荡荡。另外,这“磕头虫”并非谁想当就能当,不少是靠买的,同治及之后广东的价格是从九、末入流者80两(382页)。买也要当,足见动力之大。

何以这么多人争做贱业?其一,有面子,虽然在官场一个个都是“磕头虫”,但毕竟也是官呀,在庶民和下层绅士面前则可以威风八面,从而也捞回了在官

□王俊良



百车河畔 (水彩画)

聂仕华

■灯下漫笔

1827年,14岁的洪秀全考为童生之后,连续17年四次考秀才均名落孙山。科场失意自然引发他复杂的心理反应和强烈的行为反弹。于是,潜在的逆反思维促使他摒弃了“读书做官”的意念,寻求另类的仕途之路,即:造反——“我今为王”,“手握乾坤杀伐权”。

洪秀全造反滋生于一种仇恨的心理基因。而这种仇恨针对的绝不是科举制度,而是那些导致他屡屡落榜的考官及其考题,遂产生“让我来考天下人”的报复行为。

金田起义后,洪秀全始终将科举考试视为太平军的“悠悠万事,惟此为大”的要事之一,亲自动员、布局、定时、出题、揭榜。如1851年底,太平军造反后首次占领了小城永安,战事繁复,百废待兴,然而,洪秀全却于翌年1月举行了科举考试,并任主考。考题为《天王万寿诗联》。有史考云:这是为洪秀全

□刘吉同

差讹诈凶狠,持械横行,借口挨户搜查,掳掠财物,烧毁民房,强奸妇女。江西南昌府差役,每以查夜为名,探听殷实铺户,至更深入静时敲门进内,声言聚赌,或指吸鸦片,预令差役暗藏赌具及鸦片烟,临时伪造证据,乘机撒物,铺户畏惧栽害,私给银两,不敢与较。”真是丧尽天良,无恶不作,罄竹难书。

这是出没于全国各地的一群群横行霸道、鱼肉百姓的虎狼,多少家庭因他们穷家荡产,多少无辜因他们命丧黄泉。他们给全社会和老百姓带来了不尽的灾难。临收笔又想到了鲁迅《药》中的红眼睛阿义和康大叔,这两人应是衙役中的狱卒、刽子手无疑,凶暴、残忍、贪婪、无耻、自私,与历史上的衙役基本一个嘴脸。要说有什么不同,后者则又多了麻木和愚蠢。假如把夏瑜视作觉醒和追求文明进步的代表,那么,红眼睛阿义、康大叔之流,就是阻碍社会觉醒和文明进步的一个最愚昧最顽固的群体和力量。由此可见,清末的“磕头虫”不但坏,而且还特别蠢。

■法官日记

摄影的意义

□汪菲

不知不觉,我入了“摄影坑”已经七八年。从手机到微单,从镜头升级到配件更新,从手机APP修图到摸索PS技能,理解了光圈和快门,学习了构图和光影,也还在不断模仿让自己叹为观止的大片,希望能早日达到这样的水准。摄影陪我走过的这些岁月,不变的是热爱,变化的是摄影对我的意义。

接触摄影的头两年,满怀着一腔热情,怀揣着抓住了新爱好的喜悦,我深陷“摄影坑”不能自拔。又正值初来魔都,对魔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落满梧桐叶的法租界,充满历史文化的街道,市井气息十足的弄与邨,大量新鲜的素材直映入我眼帘。每个周末,我都会捧着相机走上魔都街头,开启一日扫街活动。这时,摄影对我来说是新鲜,是激情,是生活中的每个闪光点和小确幸。

渐渐地,我不再满足于街头的美景,开始寻觅身边人的美丽。摄影对我来说,成为了发现人闪光点的一个窗口。每次人像摄影前,我都会做足功课,找照片样片,搜罗道具,思考动作和场景。当然,最重要就是和拍摄对象的交流。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最动人的角度,也许是大笑时,也许是回眸时,甚至是皱眉时落寞时……若是有幸经我之手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情绪记录下来,便是最珍贵的了。

再后来,摄影对我来说成为了一种陪伴。仿佛是伙伴一般,他和我共同看见、听见和欣赏周边的美景。相机是我的玩伴,我的每一次快门就是在和他分享当下的心情。有时,孤独感不来源于孤独本身,而是来源于不是所有时刻都能找到合适的朋友来分享。相机对我来说,就是个很好的朋友,我可以无时无刻与他分享。

也是因为这样,我和相机有了共同的回忆。每年年底回看照片,所有的回忆就随着一张张的照片从脑海里浮现出来。每每回看这些时刻,我常常很幸福。当然,每一次美景每一个闪光瞬间,总是比不上肉眼所见的更美好、更震撼,再昂贵的镜头也永远比不上眼睛。之前的我还时常为此感到遗憾,不过现在不了。因为所有的体验感都属于我自己,即使当下分享给再多的人,别人也无法亲临现场,体会你的感受。

如今,我已经不再纠结于摄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为自己身处这份美好之中而自豪。因为这一刻,我更关注的是自己,爱的是自己。

太平军的科举考试

□沈栖

登极称王后第一次过生日。将生日和考试联姻,洪秀全的“科举情结”可谓大且深!颇为有趣的是,这一情结在太平军上层肆意蔓延。1853年,攻入南京后,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过考试,由洪秀全主持;在韦昌辉、石达开生日时,也相继举行过考试,由他俩分别担任主考。1854年始,太平军还在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举行过乡试,并专门举行过一次女科报考。即使在腥风血雨的内江期间,科举考试依然举行,由蒙得恩(洪秀全的宠臣)任正总裁、陈玉成任又正总裁。1861年,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由于王洪仁玕主持制定、由洪秀全批准的《钦定士阶条例》,却因濒临末境而未实行。

学术界普遍认定,隋代始建立科举制度。之后历朝历代的八股考试的内容都是限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南宋后又以朱熹的注疏为准。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则与之大相径庭,当有斥清朝政府、反传统文化的意涵,但更多的是颂扬洪杨、信奉邪

教、美化暴政、顺从专制的内容,考题诸如“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”“四海之内有东王”“立整纲常醒世,莫教天光鬼迷踪”“诛残妖以安良善策”“真道未知须醒悟”“平定江南论”等等。

基于笼络人心、扩大影响,太平军的科举考试没有当时清廷那么严格、那么规范,大凡应考者,只要笔试满题,且几无出格的言辞,大体上都会中一个等第,恰如《金陵省难纪略》所言:“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”。除三鼎甲赐冠服金花、次一等有袍无冠、再次者红绿绉短袄,乡试中式者谓举人(后分博士、约士、杰士),并且中式者甚夥,如1854年,湖北1000余人应考,取800余人;1857年,安庆乡试,仅潜山一县就有84人中举人。

已故学者潘旭澜曾判定: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是“孕育了一个科举的怪胎”,堪称的论!顺着其思路考量,我则认为:它是我国八股考试日臻末路的一曲挽歌。